

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成果

ZHEJIANGSHENG MAKESI ZHUYI LILUN YANJIU GONGCHENG CHENGGUO

“治世” “盛世” 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历史对当今社会建设的启示

裘 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成果
ZHEJIANGSHENG MAKESI ZHUYI LILUN YANJIU GONGCHENG CHENGGUO

“治世” “盛世” 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历史对当今社会建设的启示

裘 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治世”·“盛世”·和谐社会：中国古代历史对当今社会建设的启示/裘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7-5004-8855-2

I. ①治… II. ①裘… III. ①政治制度—历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4055 号

策划编辑 冯 斌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部落艺族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73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由绍兴文理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入学攻读历史专业，以后一直教历史、研究历史，至今 50 多年了。现在我虽已过古稀之年，但仍然坚持每日总要读点书的习惯，当然主要还是读些与研究历史有关的书籍，无论是经史、诗赋、文论、戏曲、笔记小说，以至于释道经典，我都把它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来看。因为任何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是所处时代各方面的反映。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其实，各时代的作品，应都是研究各个时代最直接的资料。

我所以对史学，特别是对中国史学饶有兴趣，这当然与我是学历史专业、教中国历史课相关的。而从学习历史课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则更是我喜欢这一学科的根本原因。因为学习历史，不仅能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也因积累了历史知识与经验，使自己对社会的发展规律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自己能跟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进步，不致落后于时代。

学过中国史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史学中两司马的著作是两颗最璀璨的明珠。他们撰史的目的也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从中探讨国家兴亡、治乱的根源。司马迁说过，他写《史记》的目的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即要探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通晓古今社会变化的轨迹，从而用以考察国家治乱的原因。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写作的目的就是古为今用，为封建统治提供有益的经验。同样，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也是一部总结历代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为求得赵宋王朝长治久安的一部著作。宋神宗以为司马光所编的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曰《资治通鉴》。可见，此书写作的本意就是为赵宋王朝的统治服务的。

古为今用，为当前国家政权提供有益的借鉴，这可说是史学最基本的一项功能，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非常重视修史的工作，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如何吸取古代“治世”、“盛世”的历史经验，总结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缺失，逐步解决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不断完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机制。这是摆在我们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裘斌同志所撰写的《“治世”·“盛世”·“和谐社会”——中国古代历史对当今社会建设的启示》一书，正是遵循着古为今用，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的一种尝试，正如他在书中指出的，古代的“治世”、“盛世”和当前提出的和谐社会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有不同的目标，也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但是，社会发展总是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现代社会毕竟是古代、近代社会发展而来的，有许多问题是相通的，甚至有些还是过去社会遗留下来的，诸如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人唯贤，惩治腐败，推进法治，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等等。总结古代社会对待这些问题的办法与经验，必定对于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裘斌同志所写的这本书中，他还综合了近年来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以为“以人为本”，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课题。

当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仍在不断深入，裘斌同志书中所述，只是他在学习中的一些体会和近几年来研究成果，而不一定是全面准确的，我们只希望随着讨论的深入，总结古今治国理念，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使这一理论深入人心，用以鼓舞各阶层的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与裘斌同志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是我从兰州退休以后，回到浙江与儿子一起生活时认识的，但是，裘斌同志诚恳热情的待人作风和勤奋踏实的学习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已成为忘年交的朋友。

裘斌同志这本著作从选题到现在放在眼前的这近三十万字的书稿，前后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他又不断请周围的同志审阅，听取意见，多次进行修改。这种认真负责的学风曾得到了校领导和同事的赞扬。

现在，这本书稿即将出版，裘斌同志让我写一篇序言，不嫌丑陋，我谨写以上表示祝贺。

齐陈骏

2009年11月于绍兴寓所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治世”、“盛世”与“和谐社会”的内涵解读	(7)
第一节 “治世”、“盛世”与上古“大同社会”考辨	(7)
第二节 古代“治世”、“盛世”与当今和谐社会 之异同	(26)
第三节 和谐社会的时代性、实质及其内涵阐释	(40)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治世”与“盛世”	(57)
第一节 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	(57)
第二节 从“贞观之治”到“开天盛世”	(74)
第三节 从“洪武祖制”到“永宣之治”	(94)
第四节 落日的辉煌：清康雍乾盛世	(113)
第三章 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的社会成因	(130)
第一节 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的思想成因	(130)
第二节 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的政治成因	(145)
第三节 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的经济成因	(166)

第四章 中国古代“治世”、“盛世”对当今社会建设的

启示 (188)

第一节 启示之一:“休养生息,轻徭薄赋”

——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生产发展 (188)

第二节 启示之二:“用人唯才,才尽其用”

——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205)

第三节 启示之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构建乡村基层和谐政治关系的 信任基础 (224)

第四节 启示之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坚持和完善党内外民主集中制 (244)

第五节 启示之五:从“人治”到“法治”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269)

第五章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292)

第一节 当前我国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

迫切性 (292)

第二节 我国现阶段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298)

第三节 加快推进我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

几点思考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17)

后 记 (325)

导 言

以史为鉴，是古今中外有作为的统治者共同的经验，也是学者们长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虽然研究和探讨的内容不一，但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通过古为今用，以实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安定。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官修史籍记录的“治世”与“盛世”，历来为统治阶级所称道。从汉代的“文景之治”到清代的“康乾盛世”，大一统时期的那种社会状态，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些时期固然称得上繁荣，但封建统治者很少关注社会的公平、合理，更不可能做到社会和谐。现今，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然是任何封建王朝的“治世”和“盛世”所无法比拟的，其愿望、手段和目标有着根本的区别。

但社会的发展总是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分析古代的“治世”和“盛世”，对当前我国的社会建设和发展仍有其借鉴意义，所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本课题组成员之一的齐陈骏先生，早在1962年就提出了封建社会“治世”的问题，认为“治世”是封建历史时期社会治理比较好的阶段。1980年，又撰文阐述关于“开皇之治”的几个问题。^①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

^① 见齐陈骏《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治世》，收录于作者文集《枳室史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刘后滨先生进一步撰文诠释“治世”、“盛世”，认为封建“治世”、“盛世”是指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它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水平，强调行帝王之道，其主要特征是政治风气良好，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对国家政权充满信心。他还指出，在历代王朝更迭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治理局面，大抵可以归入治世与乱世、盛世与衰世等概念系统之中。^① 目前，也有不少研究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层面，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治世”、“盛世”等进行了研究。如中央党校李君如先生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治世”、“盛世”不能等同于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但在其思想中却不乏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的地方。^② 又如《新华文摘》编辑部的胡元梓先生认为，就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而言，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有其诸多相同之处。例如“和”，它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③ 中国政法大学陈红太先生甚至还提出，当代中国政治无论其哲学基础、制度形态还是运作过程，与中国传统政治都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中国古代自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以后，曾多次出现了“治世”或“盛世”的景象，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和谐”社会的色彩。我们今天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同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现象，探求其基本特征、形成原因，能够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

① 参见刘后滨《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04年第2期。

② 参见李君如《和谐社会问题研究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

③ 参见胡元梓《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心理基础》，《文史哲》2004年第1期。

供一些有益的启示。^①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成了我国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先生认为：“从理论上讲，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实践上讲就是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② 上海大学的邓伟志先生则强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先生认为：“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针对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较大，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等特殊国情，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的和谐。”^④ 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先生则认为：“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⑤ 2006年10月11日通过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将前一阶段的思考作了进一步的深化，这必将引发我国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一轮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和实践。

众所周知，贞观时期，以“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为核心的治国方略的提出，是从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开始的。

① 参见陈红太《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公民政治》，《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② 参见《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第14版。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正好说明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也就是说，老百姓生活的安定，是国家安定的前提，是维持长治久安的根本，是最重要的“为君之道”。尽管中国古代不乏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但在“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古代的治世、盛世时期，统治者能将“治国之道”、“安人之道”提到如此高度，并坚持贯彻到自己的施政实践中，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也是古代治世、盛世之所以很少能够出现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从政治、经济、思想上等诸多方面来深入研究“治世”、“盛世”的成因，以史为镜、古为今用，对于现今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古代治世、盛世时期，老百姓往往愿意替政府着想，为政府承担着灾害带来的后果。根本原因是百姓对政府有信心，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而这种信任无疑来自当时治国者的威信，以及君臣共同努力营造的良好政治风气。用吴兢的话说，就是“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以人为镜，可以正人衣冠；以史为镜，可以长治久安。本书旨在将中国古代“治世”、“盛世”的成因分析和对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结合起来，通过对古代“治世”、“盛世”时期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对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出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思路 and 观点。

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治世、盛世的讨论、思考，主要集中在其背景、重要性的分析、概念和内涵的描述等理论性研究上，如《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正确认识和辨析中国古代的“治世”、“盛世”现象》，等等。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古代治世、盛世对于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的探讨，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也将是本书探讨的重点。即对中国古代治世、盛世的形成原因作一较为系统的理论

分析，并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进行认真的思考。特别是着眼于古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几个典型的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展的统治时期，对于当时治国者在思想认识、政治策略、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其背景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

在本书中，我们努力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现实问题的反思结合起来。在深刻解读目前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含义的基础上，通过全面分析古代“治世”、“盛世”的多方面成因，以史为镜，在古代传统政治文化中发掘我们今天构建新型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中国古代的“治世”、“盛世”，在当时均可以说是和谐社会，或者用一个比较准确的语汇界定，即是传统的和谐社会。因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有必要认真总结中国古代“治世”、“盛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并对当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

中国在汉唐时代是一个政治、经济非常发达的文明国家，只是由于在近代，腐败的统治者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才使得中国一步步沦为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以史为镜、古为今用，吸取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历代“治世”、“盛世”有价值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思想。就传统而言，中国是一个“人治”国家，但在“治世”却不乏人民性、民主性等宝贵的思想。中国治世、盛世的君臣往往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作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到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中，将自己的治国目标定位为历史上有过的甚至超过以往的治世、盛世。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治世”、“盛世”，作为传统中国古代社会富有典型意义的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时期，在当时

治国者的思想认识、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中，蕴含着许多今人可以借鉴和传承的思想、理念。因此，汲取古代“治世”、“盛世”蕴含着的富有的治国思想和为民之道，对于现在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这正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或许，这也是本书思考的价值所在。

第一章

“治世”、“盛世”与“和谐社会”的 内涵解读

第一节 “治世”、“盛世”与上古 “大同社会”考辨

一 “治世”、“盛世”概念解读

（一）何谓“治世”与“盛世”

“治世”与“盛世”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时期，表现为社会稳定，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因此一直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津津乐道。然而，翻开中国漫长的历代王朝兴亡史，其中既出现了为数很少的“治世”、“盛世”，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衰世”、“乱世”。历史发展的轨迹如同波浪起伏的大江长河，波峰和波谷相继，既雄奇壮观，又令人感慨万千。历代的兴亡更替，似乎一直在遵循着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每一个王朝从创立伊始至王朝中期，大多能够出现一个稳定、兴盛的局面。但是，盛极往往不免中衰，在辉煌过后紧接着出现的却往往是另外一番衰乱的景象。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出现的“治世”、“盛世”才显得弥足珍贵，引起了历代史官和史学家对王朝更迭和治乱兴衰等历史现象的探讨，并构成了对治国理念进行总结反思的核心内容。

早在战国秦汉之间，诸子就对治世和乱世的区分以及成因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如《荀子·大略》从义利关系上来区分治世和乱世：“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而《吕代春秋·观世》在分析“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的原因时，则提出了圣人（欲治之君）与士（欲治之臣）都少有，即使偶尔出现了也难以相遇的观点。汉代的董仲舒则从天道和人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并提出：“天出此物（春夏秋冬）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与春夏秋冬相对应的好恶喜怒），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又提出：“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①

除了探讨治世和乱世，东汉时期，又出现了“盛世”的概念，汉和帝时崔骃在告诫外戚窦宪时提出：“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不可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②唐宋以后，盛世的观念使用得越来越多，但是，都没有对盛世的概念作出界定。汉魏之际的历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政体》中，把国家政局分为治、衰、弱、乖、乱、荒、叛、危、亡九种形态，其中没有将盛世作为一个独立的形态列出。

由此可见，对于到底有没有盛世，治世与盛世有什么区别，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② 参见刘后滨《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2期。